

江西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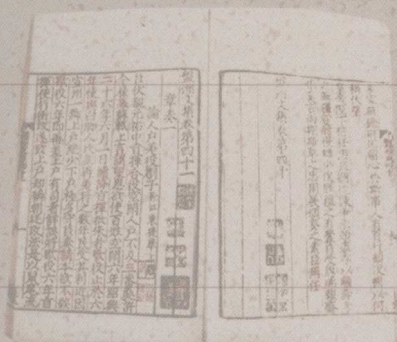
6

钟起煌 主编

南宋卷

许怀林◎著

江西出版集团 · 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通史

主编 钟起煌
顾问 周銮书
副主编 邵 鸿 彭适凡(常务) 方志远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西通史·南宋卷/许怀林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3
(江西通史/钟起煌主编)

ISBN 978-7-210-04065-1

I. 江… II. 许… III. 江西省—地方史—南宋
IV. K2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2780 号

江西通史·南宋卷

许怀林 著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32.25 插页:4

字数:520千 印数:1—3200册

ISBN 978-7-210-04065-1 定价:65.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s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①



②



③



④

- ① 淳祐十二年青白釉和尚纽炉（上饶出土）
- ② 绍兴三十年青白釉牡丹纹碗（新建县出土）
- ③ 南宋褐黑釉碗（赣州市七里镇窑址出土）
- ④ 南宋青白釉孩儿枕（枕面残缺 景德镇湖田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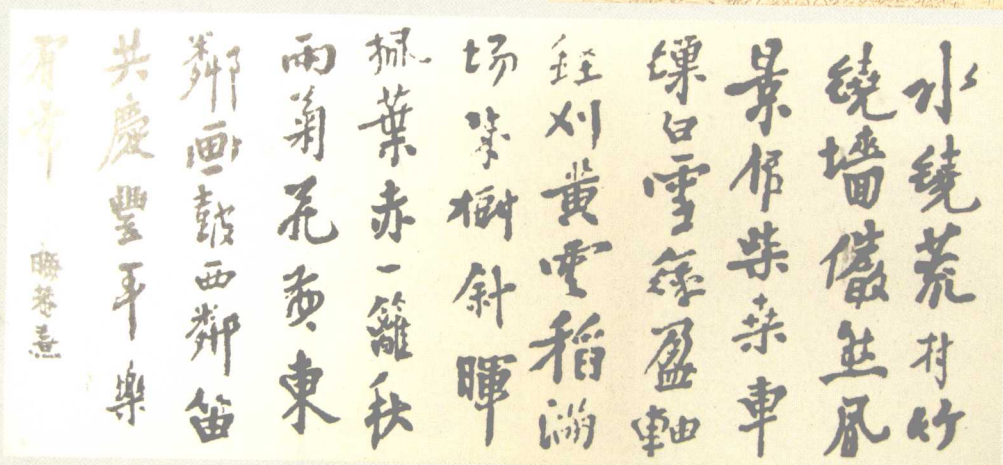
①



③



②



④

① 文天祥画像

② 民国25年影刻宋院画滕王阁图

③ 朱熹对镜写真像

④ 朱熹手迹“卜筮贴”

总序

钟起煌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是由机缘而起因执著而成,包括我们这部《江西通史》。

说由机缘而起,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几乎纯属偶然。2002年夏天,我和彭适凡、孙家骅同志谈到江西悠久的历史、谈到江西辉煌的文化,因而产生了组织专家编撰《江西通史》的设想,彭、孙二位当即认为此举当行而且可行。

说因执著而成,是因为一旦有这个想法,而且认为这是一件研究江西历史、弘扬江西文化的重要工程,就决心去做。为此,我征询了周銮书同志的意见,并邀请邵鸿和方志远同志共商此事,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2002年10月18日,在江西省文物局和江西师大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共同举办的全省文博教育成果展示与经验交流会上,我向大会通报了编撰《江西通史》的意见,引起全体代表的热烈反响,大家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表示支持,认为这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挖掘和整理江西传统文化、推进江西经济文化建设的一大盛事。有了这个共识,12月13日,准备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在我的主持下,召开了有关专家和编辑人员的联席会议,对编撰《江西通史》的指导思想、作者人选、工作日程、成果形式等具体问题展开了比较细致的讨论。2003年2月15日,召开了第一次编撰工作会,《江西通史》的编撰工作就此正式启动。

虽然说是机缘和偶然,但新的《江西通史》的编撰,实具备诸多因素和条件。

一、江西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在江西这块土地上,人类的活动至少已有20万年历史,它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和古代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末五代以来,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遂为

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其物产之富、人才之众,举世瞩目;进入20世纪,江西又因为中央苏区的建立而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很难想象,在十分漫长的时段里,没有江西的中国历史将会是什么样子。

二、文献与实物资料丰富。江西既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唐王勃语),又素称“文章节义”之邦(宋司马光语)和“人文之薮”(清乾隆帝语),存世官修私撰文献极为丰富。近年来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既可弥补文字记载之不足,更可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为编撰《江西通史》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证材料和科学依据。

三、前期成果丰硕、学术队伍整齐。老一辈的历史学家仍然健在,他们不但学术积累深厚,而且对研究江西历史有着强烈的责任心;中青年学者正趋成熟,他们继承了前辈学者的严谨学风,又吸收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思维敏捷,勇于创新。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年来已有大批高质量的有关江西历史的学术成果问世,这些成果涉及江西历史的方方面面,为编撰《江西通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四、政治环境宽松、经济形势发展。盛世修志是中国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江西经济和全国一样,有较快速度的发展。这为编撰《江西通史》提供了自由的学术气氛和比较充裕的财力保证。近年来,江西的学术事业和出版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连续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给江西文化艺术界和学术界以振奋,也引起了各兄弟省市的关注。这些成就的取得,为我们组织大规模著作的编撰工作提供了经验。而周边各省如湖北、湖南、浙江以及其他省市新编通史的纷纷问世,对《江西通史》的编撰是有力的推动,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从我个人来说,当时也恰恰能分出一些精力和时间来抓这件事情。于是尽力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为作者们、编者们排除各种障碍,以保证这项重大工程的圆满完成。

四年来,《江西通史》的编撰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黄智权、吴新雄省长亲自过问此事并指示有关部门给予支持,省政协将其作为一件大的文化事业进行推动,省社联将其列为重大科研项目,江西师大、南昌大学、省社科院、省文物局、省博物馆和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也对参与编撰的专家们给予各种便利,出版部门派出了强大的编辑班子并准备了足够的启动和出版资金。特别要指出的是,各位作者在繁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能够将《江西通史》的

写作列入重要的工作计划并全身心地投入。我在第一次全体编撰会议上指出,《江西通史》的编撰是一项挖掘和弘扬江西历史文化传统的千秋事业,希望作者和编者将其视为自己学术生涯中的事业。事实证明,作者和编者后来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正是因为有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全体编撰人员的共同努力,11卷的《江西通史》才能顺利地完成书稿并得到如期出版。

明代中期,随着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修撰地方志成为一大文化现象。各省、各府乃至各县的省志、府志、县志大量涌现。此后遂为传统。盛世修志也不仅仅限于修前朝历史,更大量、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乃是修当代地方史。具有全局意义的江西省志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自明中期以来,江西整体史著作已编撰过多部,其中著名的有:林庭楫《江西通志》(37卷,明嘉靖四年),王宗沐《江西省大志》(8卷,嘉靖三十五年;万历二十五年陆万垓增修),于成龙、杜果《江西通志》(54卷,清康熙二十二年),白潢、查慎行《西江志》(206卷,康熙五十九年),高其倬、谢旻《江西通志》(163卷,雍正十年),刘坤一、刘绎、赵之谦《江西通志》(180卷,光绪七年),吴宗慈、辛际周、周性初《江西通志稿》(9编,民国三十八年)。20世纪末,又有许怀林的《江西史稿》(1993年,江西高校出版社),陈文华、陈荣华主编的《江西通史》(1999年,江西人民出版社)问世。这些著作在保留江西历史遗存、挖掘江西历史文化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何在充分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是对新编《江西通史》的考验。

为了使新的《江西通史》更具有时代特色和历史价值,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对这部著作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一、中国历史是一个整体,我们在研究任何地方历史的时候,都不能脱离这个整体。因此,正确认识各个历史时期江西在全国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必须充分关注江西与中央、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不溢美、不自卑,不关起门来论江西,将《江西通史》写成一部与中华民族的整体有着血肉联系的江西历史。

二、《江西通史》是系统记述和研究江西历史的大型学术著作,由众多学者共同参与完成。一方面,各卷是作者的个人成果,是作者最新研究成果的结晶,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所以希望作者精益求精,使其成为各自领域的学术精品。另一方面,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它又必须是一个整体,是一部“通史”,所以全书11卷必须有统一的体例和统一的要求,在文风上一定要力求简洁、明快。各卷作者务必服从整体、服从大局,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整个《江西通

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江西通史》必须是一部真实、动态、有可读性的信史。所谓真实,是指史料翔实、言必有据。此“据”是经过考证后认为合理的,否则,“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语)。这就需要每个作者既尽可能地系统爬梳和挖掘史料,又谨慎辨析和使用史料。所谓动态,是指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既将问题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又特别关注它的演进过程,因为即使是同一件事物,其状态和作用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这就需要每个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阐释历史、去探讨历史演进的规律。所谓有可读性,是指应该用流畅的文字、叙述的方法写作,展示的是作者的观点和结论,而不是考辨的过程,它的体例是史书而不是论文。无图不成书。图文并茂是中国出版物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特点,《江西通史》应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收集能够说明江西历史各阶段各方面状况的历史图片,以加强其历史感和可信度,同时也使其更具有可读性。

四、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基层社会为本。所谓以人为本,指的是要写成人的历史,以人的活动为描述对象,即使是制度、习俗,也应尽可能地有人的活动。所谓以民为本,指的是尽可能地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来叙述历史、看待历史,更多地叙述大众的活动。所谓以基层为本,是因为地方史本身就是基层乃至底层的历史,要尽可能地揭示基层组织和底层社会的活动状况。在此基础上,充分重视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对社会的主导作用,重视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特别是包括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实政治制度等在内的上层建筑对个人、对大众、对底层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写成一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互动、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互动、社会精英与人民大众互动的历史。

11卷本《江西通史》即将付梓,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够成为江西历史研究的新的里程碑、能够成为江西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当然,能否达到这个目标,还要由读者和历史来检验。

前言

南宋(1127—1279),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它的统治地域主要在江南,比北宋辖区小,比汉唐元明清更要小,但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水平却相当高,不仅超越了前代,有不少内容甚至元明清也赶不上。整个江南大地的快速发展,在江西地区有充分的表现。江西社会在南宋时期的进步,得益于国家全局形势的推动,也是在本身已有基础上的继续演进。尽力展示南宋江西地区的社会状况,是我国区域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全面认识南宋社会的丰富内涵,也是十分有益的。



南宋偏安江南,与之并立的地方政权,先有北方新起的金朝,打进汴京,俘虏徽宗、钦宗,灭了北宋,随后才有南宋,因而他们是世仇,长期在战争与和议之间对峙。宋金之间的战争与抗衡经常处于严峻状态,给南宋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影响。都城在今天宁夏银川市的夏朝,因为南宋没有能够守住祖宗时代的“家业”,退处长淮以南,与西夏没有边界接触,故而相互没有争端。西南方面,云南有大理政权,西藏地区有吐蕃政权,西边的新疆还有几个小政权,他们与临安的南宋距离很远,基本上也都没有利害冲突,可说的事情都很少。南宋中期以后,蒙古族迅速强盛起来,建立了蒙古王朝,蒙古骑兵在向西远征的同时,也南下扩大统治范围,依次攻灭了西夏、金朝和大理等王朝,从理宗端

平元年(1234)开始,取代金朝与南宋尖锐对抗,四十余年之后最终将南宋灭亡。立足于江西地区考察,影响鄱阳湖——赣江流域社会发展的外力,也是金兵、元兵两股政治势力。

南宋是北宋的继续,从统治制度方面看,只不过京城由汴梁迁到临安,统治地域更缩向南方,而实质内容没有变化。江西依旧是分隶于江南东西两路,我们继续使用“江西地区”一词涵盖13州军。宋朝政权的非实质性的变异,对江西地区的影响很大,一方面是江西比北宋时期靠近了政治中心——京城,江西既是屏障临安朝廷的坚强后方,又是朝廷辖控岭南、四川大地的前哨基地。从向子湮支持赵构登基称帝,到文天祥组织义兵勤王抗元,贯穿南宋9帝全过程,都有江西人在朝廷肩负重任,至于充当州县长吏者更多,他们的作为对全局与区域的发展都有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朝廷对江西的整体控制增强,对江西的财政需求进一步加大,江西地区是南宋在两浙之后的第二个核心区域,在国家舞台上的地位有了全面提高。摆在我国历史发展大局上衡量,南宋时期的江西地区无疑是社会链条上关键的一环,它的存在与运转,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二

在南宋的150余年期间,江西保持北宋时期的社会大发展趋势,继续向前推进,达到新的高度,增添了新的时代气息。生产领域中充分显示了“盆地经济”特色,及其明显优势。由大大小小的盆地发育而成的农耕文明基地,在建炎、绍兴年间遭受兵灾的惨重破坏,却凭借劳动力优势和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农村迅速复苏,丘陵山区的盆地得以普遍开发,梯田面积增加,经济区域扩大,耕作水平提高,麦类播种得到推广,以稻米为主干的粮食产量增多,甚至出现“梯田米贱如黄埃”的景象,因而在满足本地四五十万人口消费之外,还能够常年输出巨额的漕粮和商品粮。经济作物除原有的品种之外,新增了棉花,丰富了纺织原料。手工行业中的纺织、陶瓷、刻书等都有新的进步。水陆交通畅通,以洪州为核心的江西成了东西与南北交通的枢纽地。航运交通更加便捷,商品贸易繁荣。采矿和钱币铸造业生产比不上北宋,产量明显衰落,究其原因,一是矿藏有旺枯变化,二是经营管理方面弊病丛生,积累下来的破坏性难以克服。

鉴于市场交易的竞争需要,抚州布商陈泰开创出包买商的经营方式,把商

业资本发展到苧麻种植、麻布织造领域中去。活跃而富有生命力的农村经济,激发出都昌曹彦约建造“湖庄”,于园林别墅中大规模掺进农事,形成稻麦、鱼虾、林果兼具的生产型农庄。陆九渊在弘扬儒学的研究中,关注农田生产,对稻田深耕、水稻亩产作出精确评估,提出了详细的观测数据。周必大致仕之后,在家全力组织刻板印刷,精选版本、细心校对,并使用活字印刷成功,有产品问世。这些事例,虽然未能激荡起社会大潮,好似天空流星,一晃而过,却也是难能可贵的新创造,给后世留下积极的思考资料。

三

书院教育隆盛,思想领域的气氛活跃,文化水平大有提高,构成南宋时期江西人文事业的主导优势。民办书院教育进一步普及,兴起读书与藏书之风。一批“墨庄”型的家族书院,很有成效地传授儒学经史知识,灌输伦理道义。众多的乡先生活跃在各州县,辛勤地在私家书院中从事教学,极大地弥补了州县官学数量的不足,成了地方教育的主要机构,培养出比北宋更多的举人、进士。由于一些地方官对学术的浓厚兴趣,希望借书院宣扬其学术主张,对书院十分投入,建设起白鹿洞书院、象山书院、白鹭洲书院、东湖书院等著名的官办书院,这些官办书院在适应科举需要之时,又成为宣扬与传承道学思想的阵地,^①使朱陆等学派的道学理论在江西、浙东等地发展起来。科举教育在发展中出现的弊端愈加明显,遭到社会批评,然而它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不可否认,士人以科举出仕为人生的一個目标,它正表现出强劲的吸引力。

道学(理学)作为传统儒学发展的新阶段,经过北宋的酝酿,在南宋前期已经确立。从其主要学派及主要领军学者活动事迹考虑,江西地区是道学的一个重要发祥地,也是重要的传播基地。南宋思想家在研究与弘扬道学理论过程中,因侧重点的差异,形成若干个学派,其中朱熹、陆九渊为首的两个主要学派,在赣东北的南康军、饶州、信州、抚州、建昌军等地,长期传承延续。在临江

^① 淳祐六年(1246)知隆兴府吴泳在《御书宗濂精舍跋记》中,对官办书院的建立有批评性的见解,他说:“臣尝考国朝建立书院,隶于今职方者三,潭曰岳麓,衡曰石鼓,南康曰白鹿洞,皆由上方表赐勅额,盖所以揭圣范,崇道规也。道术既裂,圣真无统,士各阿其所好而立之师门,各尊其所授而名其学,刊山结庐,互相标榜,书院精舍之名几遍郡国,殆失古者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之义。”见《鹤林集》卷三八。

军、吉州一带有刘靖之、刘清之兄弟的道学群体,他们不拘门派,博采众长。朱熹道学体系中的丰富内容,关于教育与学习的真知灼见,对儒学经典的注疏整理等,都对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陆九渊出身平民士人,没有宦官政治生态环境,治学上接孔孟,宏传“心学”思想,他的许多精致论点,如关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对自身言行实践的严格要求以及出色的政绩,令同辈和后生信服,在江西和浙东地区都有广泛传播。

鹅湖之会,是一次学人之间的自由集会。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刘清之等学者在学术上“和而不同”,相互都有仰慕之心。这一群学者彼此友好切磋,既有交流的继续,带来不同学派之间进一步的交流与争鸣,打破了思想界的沉闷保守状态,又增进了相互了解,催生出学术发展的繁荣。此后,朱熹在江西备受尊敬,众多士子投入门下;陆九渊应朱熹之邀请,在白鹿洞书院讲“义利之辨”,获得巨大成功;刘清之得到吕祖谦的欢迎,在丽泽书院居留讲学,显然都是鹅湖之会孕育出来的硕果。庆元年间的权势争夺,演化为对“伪学”禁锢,一批江西学者成了主要的打击对象。在朱陆的后继者中,有人因官场利害矛盾,借师说标榜自己,把学术上的争论演化成门派矛盾,权势的角逐,遏制了学术思想的健康发展。

四

北宋时期的“义门”大家族继续繁衍下来。然而,江州“义门”陈氏那种纯正的大锅饭生活的聚居方式,逐渐起了变化,抚州“义门”陆氏已经改为大锅饭与小锅菜相结合,表现出小家庭经济的生气。因为农耕生产的兴旺,书院文化的高涨,滋生出更多的富室与官绅家族,他们积极参与地方治理,或积极陈述地方弊病,参谋州县政务;或组织乡民武装,维护社会治安;或热心于公益事业,兴办社仓、赞助贡士、兴建桥梁等,增强了社会发展后劲。一批学术型家族如鄱阳洪氏,金溪陆氏,吉水杨氏,清江刘氏、徐氏,余干赵氏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家学传统优势,孕育了不少学有所长的精英,各自在经学、史学、文学、医学、堪輿和宗教等传统学术领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与此同时,还有一批豪强势家,武断乡里,甚至残害小民,激化了社会矛盾。

战乱频繁,民众的反抗斗争迭起,是江西在南宋时期突出的社会问题。这既有国家大局的连载关系,也因地方本身的社会问题所引起。建炎、绍兴年间,

先有李成等溃兵流寇在赣北的骚扰破坏，后有金兵沿赣江南下追赶隆祐太后的屠戮蹂躏。南宋的官军良莠不齐，不少兵马是在怕死的武将统领之下，扈从隆祐太后的卫队，上阵打仗无能，却有残害百姓的凶恶。内外矛盾交织，官府苛征暴敛，使民众处境困苦，激发了吉州、虔州等地民众的反抗暴动。经岳家军的严厉军事征讨，局面才慢慢安定下来。进入中后期以后，赣西有茶商军的活动，赣南爆发了陈三枪等人为首的暴动，赣东有佃农的长期反抗斗争。南宋末年，江西全境展开了一场浩大的抗元战争，参加者十分广泛，既有官绅大族，也有农商民户，僧道人士。宁都县六姓群众，永新县3000余名刚烈子弟，为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浴血奋战，舍生取义，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遗产。

“文章节义”之邦的地方文化优势凸显光辉，大批“文节俱高”的精英群体显示出强劲活力。政治上洪皓以坚贞的民族气节赢得赞誉；杨邦义、胡铨、王庭珪等人凛然正气，反对投降、怒斥权奸的忠烈作为，传扬南北。杨万里等人坚守正义，不以自己的才学与权贵做交易。在元军南下灭宋的危难之时，“只知有是非”的江万里在努力无望情况下，毅然投水明志，以身殉国。谢枋得不顾势单力孤，在信州组织武装，抵抗元军，失败以后隐居闽中，宁愿饿死，誓不向元朝称臣。文天祥高举抗元义旗，组织军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闽赣粤多次掀起抗击元军南下的斗争高潮。兵败被俘之后，以浩然正气对抗威逼利诱，誓死不屈，血洒大都，“留取丹心照汗青”，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五

对南宋历史的研究，专题性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宋金之间的战争与交往关系问题，二是宋元之间的战争问题，三是理学思想与学派论辩问题，四是书院教育与科举问题。围绕这些大问题分别研究相关人物、事件以及代表著作的诠释，已经发表的论著很多。就南宋历史进行总体性的考察，把政治、经济、军事、学术、宗教以及社会生活连贯起来进行研究的，显得稀少。与北宋史的研究比较，学术界对南宋的研究不够。徐规先生指出：“以往两宋史的研究者多将重点放在北宋，或者厚北宋而薄南宋，这固然有着南宋史料不足（特别是最后五十年），典章制度大致相类似的具体原因，但也存在着轻视南宋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倾向。”（《南宋史稿·序言》）目前已出版的南宋史，是何忠

礼、徐吉军著《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是“一部有很高学术水平的著作”。然而,它只有政治军事编、文化编,另外的经济和对外关系两部分尚在编撰之中。贯通北宋、南宋的著作,有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其凡撰的《宋代史》(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这几本宋代历史著作都以较多的篇幅写了南宋,对我们把握南宋一代的社会全貌,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关于宜春李渠的研究,利用了万历《袁州府志》中的南宋《李渠志》资料,对李渠从唐至清约千年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拓荒性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将李渠的兴建和农业经济发展、地方社会建设紧密联系考察,充分揭示出李渠的经济价值和历史意义。斯波义信教授研究历史的广阔视野,敏锐的思维,值得我学习,其成果对本书的写作有紧要的参考价值。然而,他是以李渠这项水利工程观照宜春千年历史,而万历《袁州府志》只见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我们还无法了解南宋《李渠志》的原貌。所以,企图复原南宋李渠与袁州宜春的历史,还有实际困难。

美国学者罗伯特·海姆斯《政治家和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地方精英》一书,对抚州两宋时期的举人、进士和官僚的生存背景、历史源流及其简要表现进行了综述,其中关于地方防御、社会赈济、寺观建筑与宗教生活,有专章描述,然后总括性衡量抚州在全国的地位,是一部宋代三百年抚州地区断代史,书中有大量地方志资料,并在有关问题的论述中,详细评议了众多美国、日本学者的相关论点。作者的研究方法和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对江西社会历史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当然,就江西13州军而言,不是每个州军都有条件做成抚州那样。如果类似宜春李渠、抚州精英这样厚实的专题成果再多几个,那么江西全境的历史叙述,就将更丰富多彩。

就南宋的江西地区而言,还没有断代性的学术成果,大家关注的是朱熹、陆九渊、杨万里、江万里、文天祥、谢枋得等名人物的研究,成果丰硕。白鹿洞书院、白鹭洲书院、象山书院等书院教育的研究也受到重视。至于农工商经济、群众生活、民情风俗等社会情状,则少有涉猎,综合性的南宋江西历史著述则至今没有。已有的研究尚须深入扩大,欠缺的领域亟待开拓弥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其中难度之大自不待言。既受资料零散,数量不多的限制,也因历史研究大趋势的影响。南宋考古成果的整理及与社会历史的连接研究,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从总体上看,南宋的朝廷档案文献不如北宋齐备,有的事项很难